

学术思潮与史学发展的互动(专题讨论)

编者按: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总是会受到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打上时代学术思潮的烙印。要了解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及其特点,就必须了解中国传统学术思潮的发展和演变,进而探寻其对时代史学发展的影响作用。本期这一组专题讨论,就是针对该问题所作的一些思考。汪高鑫的文章论述了在玄学兴盛背景下,魏晋南北朝史学出现明显的玄化倾向,表现在重视以玄学的观点来品评人物和评论历史;王记录的文章论述了在理学兴起的背景下,宋代史学出现了重视以天理的标准来撰述历史、评判历史,史学表现出了义理化特征;李孔胜的文章从经史关系、史论和历史编纂三个方面,具体论述了王阳明心学引起的中晚明史学发生的新变化。

玄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玄化倾向

汪高鑫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要:玄学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思潮,对于这一时期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魏晋玄学背景下,才性之辨自然成为清谈的重要品题,人们重视形象与智慧,追求虚静、玄超的精神境界,反映在史学上,则是不但重视人物品藻,而且以玄学的观点来品评人物,局量才识与容貌成为人物品评的基本内容。玄学的清谈,当然不限于人物,也有历史,有名理,反映在史学上,则表现为重视历史评论,重视宣扬顺天达命与维护名教,主张为政贵在安静,以及强调对历史发展之势的总结,便是这种历史评论玄化倾向的主要表现。

关键词:玄学;魏晋南北朝史学;人物品评;历史评论;玄化倾向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2-0140-09

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学术思潮,它兴盛于魏晋,持续发展于南朝。玄学的兴起,与东汉经学流于繁琐、迷信,“缺乏哲学高度的整体思考”,以至最终衰落有着密切的关系。与经学不同,玄学的特征“是用老庄思想解释儒经,并且只

把儒经作为一种凭借,重点不在疏通经义,而在发挥注释者自身的见解”^{[1]621 628},因而也是一种注重义理的哲学思潮。作为一种时代哲学思潮,玄学必然会对这一时期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带来影响,史学当然也不例外。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表现出了明显的援玄入史的玄化倾向。以下试从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两个方面,对这一时期史学的玄化倾向作出具体论述。

收稿日期:2013-12-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史流变探源”(11JJD770014);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研究”(06JJD770005);北京师范大学教改项目“中国古代儒学发展史”(10-01-05)

作者简介:汪高鑫(1961—),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

与两汉经学背景下重视砥砺品节的人物品评不同,魏晋玄学背景下士人文化的人物品评,则转向形象与智慧,追求虚静、玄超的精神境界,重视

人物才性之辨。这种人物品题的变化 ,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玄学的兴起是息息相关的。随着汉末三国群雄并起 ,刑名法术得到重用 ,任人唯才成为时尚 ,重视人物才性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而玄学兴起之后 ,提倡道家的重精神、天才主张 ,追求神理、神明的精神境界 ,才性之辨自然成为清谈的重要品题。魏晋才性之辨的具体内涵 ,主要包括容貌、才能与精神三个层面。容貌是关于人物外表的描述;才能往往会根据人物的特点 ,冠以“天

才”“大才”“奇才”“俊才”“高才”等不同称谓;而精神则是一种神味 ,往往以“神明开朗”“神锋太俊”“明慧若神”等作形容。

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 ,这种才性之辨成为人物品评一时风尚。成书于曹魏时期的刘劭的《人物志》 ,堪为系统品鉴人物才性的代表性理论著作。该书《流业》篇依据人物才能分成十二类 ,一一叙述各类才能的特点 ,并举出其代表人物 ,此列表如下:

才 能 类 型	才 能 特 点	人 物 举 例
情节家	德行高妙 ,容止可法	延陵、晏婴
法 家	建法立制 ,强国富人	管仲、商鞅
术 家	思通道化 ,策谋奇妙	范蠡、张良
国 体	德厉风俗 ,法正天下 ,术谋庙胜	伊尹、吕望
器 能	德率一国 ,法正乡邑 ,术权事宜	子产、西门豹
臧 否	好尚讥诃 ,分别是非	子夏
伎 俩	能受一官 ,错意施巧	张敞、赵广汉
智 意	权智有余 ,公正不足	陈平、韩安国
文 章	能属文著述	司马迁、班固
儒 学	能传圣人之业 ,而不能干事施政	毛公、贯公
口 辨	辩不入道 ,应对资给	乐毅、曹丘生
雄 杰	胆力绝众 ,材略过人	白起、韩信

南朝玄风继续兴盛 ,成书于南朝、记载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逸闻趣事的小说《世说新语》 ,则是刘义庆主持编写的这一时期品藻人物的又一部力作。该书有关于人物容止的品评 ,如《容止》篇记载何平叔“美姿仪 ,面至白” ,“嵇康身长八尺八寸 ,风姿特秀” ,“虞子嵩长不满七尺 ,腰带十围 ,颓然自放” ,如此等等。也有大量关于人物才能的品评 ,如该书卷上就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来品评人物 ,对人物才能进行分类。《识鉴》篇记乔玄说曹操“君实是乱世之英雄 ,治世之奸臣” ,裴潜答曹操问刘备之才说“使居中国 ,能乱人 ,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 ,足为一方之主” ,此等品评散见各篇者很多 ,不一枚举。更以品藻人物精神为其特色 ,如《德行》篇记郭林宗评黄叔度说“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 ,澄之不清 ,挠之不浊 ,其器深广 ,难测量也” ;《赏誉》篇记世目李元礼“謏謏如劲松下风”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 ,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 ,人皆钦其宝 ,莫知明其器” ;《容止》篇记人见嵇康叹曰“萧萧肃肃 ,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 ,高而徐

引”、其“为人也 ,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 ,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如此等等 ,皆是对人物精神境界作出的测度。

在魏晋玄风大盛的背景下 ,这样一种人物品评风气也波及史学之中 ,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撰述不但重视人物品藻 ,而且往往以玄学的观点来品评人物。众所周知 ,历史撰述离不开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 ,但是这种评价是基于历史人物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的评价。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撰述 ,其历史人物评价虽然也涉及历史本身 ,肯定历史人物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联性 ,却更加喜好从才性角度出发 ,重视对历史人物个性特征的品评。白寿彝先生将这一时期历史撰述的人物品评特点归纳为两个方面:局量才识和容貌^[2]。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历史撰述中 ,陈寿的《三国志》、袁宏的《后汉纪》和范晔的《后汉书》堪为其中的代表之作。

《三国志》重视人物记述与评论 ,与其所记述的三国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 ,三国是

中国历史上风云突变、英雄辈出的时代,诚如清人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所言,“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作为反映三国历史的史书,自然会重视对三国人物的记述,作出对三国人物的评论。这样的人物记述与评论,继承了反映“秦汉之际”历史的司马迁《史记》等历史撰述的传统,是要将历史人物评判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只不过这方面的人物评论,《三国志》显得比较薄弱,比起《史记》要逊色得多。

不过,《三国志》重视人物品评,则是其一大特色。这与在魏晋玄风下,魏晋那个门阀世族时代的人们重视品评人物和清谈分不开,当然也与陈寿本人曾经担任过巴西郡中正这样一个品第人物的官职和经历有关。《三国志》品评人物的兴趣极大,涉及所记载的众多历史人物;而品评人物的角度,则一是局量才识,二是容貌。这里的局量才识是指气质(或神态)与才能,而容貌则是指外表特征。

首先说局量才识。其一是设立人物品目。如称曹操是人杰,刘备是英雄,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是良将,关羽、张飞、程普、黄盖等人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陆逊是社稷之臣,潘濬、陆凯是良牧,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徐邈、胡质、王昶、王基是彦士,董厥是良士,许慈、孟光、来敏、李譔、尹默是学士,吕蒙是国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①

其二是人物分类品评。其中文藻如魏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曹植“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后叶”,王朗“文博富贍”,王粲“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武艺如曹彰,“武艺壮猛,有将领之气”,郑宝“最骁果,才力过人,一方所惮”,乐进“以骁果显名”,黄忠、赵云“强挚壮猛”,刘封“有武艺,气力过人”;谋略如郭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程昱、董昭、刘晔、蒋济等人“才策谋略,世之奇士”,陆逊“既奇诡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周鲂“谲略多奇”;忠烈如夏侯淳“以烈气闻”,司马芝“忠亮不倾”,太史慈“信义笃烈”;刚直如苏则“矫矫刚直,风烈足称”,孙礼“刚断伉厉”,辛毗、杨阜“刚亮公直,正谏匪躬,亚乎汲黯之高风焉”;清高如管宁“清高恬泊,拟迹前轨,德行卓绝,海内无偶”,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德行如邢颙,人称“德行堂堂邢子昂”,杨俊“人伦行义”,楼玄“清白节操”;宽厚如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

盖有高祖之风”;政事如诸葛亮“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荀攸、贾诩“庶乎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欤”;儒学如谯周“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研精《六经》,尤善书札”,严畯、程秉、阚泽“一时儒林”;方技如“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周宣之相梦,管辂之术筮,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也。”如此等等。

其三是通过人物对话与评述,点画出人物的才性。如《魏书·魏武帝纪》记述曹操年少之时,桥玄对其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写出桥玄对曹操的安世之才有先见之明。如《蜀书·先主传》记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之事“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这寥寥数语,既表现出了曹操的气势和眼光,也透过刘备的惊恐失态之举反映出了这位“潜龙”的志向。如《蜀书·关张马赵黄传》记述道“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马超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翼德(张飞字)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段话既刻画出了关羽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也充分反映出了诸葛亮的机智与风度。如《吴书·吴主传》记述刘琬语人说孙权道“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然皆祿祚不终,惟中弟孝廉,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尔试职之。”这里既有关于孙权的容貌描写,也有对其才性的肯定。陈寿本人也对其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可以说通过人物对话与评述来点化人物才性,是《三国志》惯用的手法。

同时,《三国志》还非常重视从容貌去品评人物。如说袁绍“姿貌威容”,刘表“长八尺余,姿貌甚伟”,臧洪“体貌魁梧,有异于人”,公孙瓒“有姿仪,大音声”,崔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管宁“长八尺,美须眉”,何夔“长八尺三寸,容貌矜严”,程昱“长八尺三寸,美髯髯”,刘备“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诸葛亮“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关羽“髯之绝伦逸群”,彭策“身長八尺,

① 所列人物品目参见白寿彝《陈寿与袁宏》(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同时对照《三国志》相关人物传记作了调整和补充。

容貌甚伟”孙策“美姿颜”孙权“形貌奇伟,骨体不恒”张昭“容貌矜严,有威风”周瑜“有姿貌”,程普“有容貌计略”董袭“长八尺,武力过人”,如此等等。^①

《三国志》以简洁著称,然而其品评人物可谓“不厌其烦”,之所以如此,主要是魏晋世族风尚的一种体现,却也内蕴了重视人事的思想。这些“历史人物评价,多数是没有神意的说教。陈寿的品评,带有魏晋清谈的风格,这种突出人物的个性的评价,重视人物的才能、品德、风貌,强调了人事在历史的兴衰中的作用,这在史学思想上是进步的表现。”^{[3]140}

袁宏既是史家,也是玄学中人,故而《后汉纪》的人物品评也非常突出。我们可以从人物连类记述和才情风貌描写两方面,窥见《后汉纪》重视人物品评之一斑。

人物连类记述是《后汉纪》的重要特点。《后汉纪》记述人物不但重视分类,全书涉及的人物类别有帝王、后妃、宗室、外戚、名臣、循吏、儒林、文苑、党锢、宦者、方士等,几乎囊括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各类人物,而且善于运用连类的方法来记述人物,并且形成《后汉纪》人物记述的重要特点。《后汉纪序》明确提出该书的人物撰集方法是“言行趣舍,各以类书”。所谓“类书”,即是要将时代相近的同类历史人物连续书写出来。如卷五连续书写了闵仲叔、王丹、严光、周党、王霸、逢萌等一批人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隐居避世,或者长期隐居,或者终身隐居。其中闵仲叔屡征不至,“终于家”;王丹曾在王莽时“连征不至”,“避世陇西,隐居养志”;严光与光武帝同学,因不愿意被征而“变名姓”,后不得已应征,终不为三公封赐所诱惑“称病而退”;周党“三征然后至”,却矢志隐居,光武帝只好下诏说“不食朕禄,亦各有志”;王霸被征后“拜不称臣”,“遂以疾归,茅屋蓬户,不厌其乐”;逢萌先是隐居琅玕不其山中,东汉初年“连征不起”。如卷六连续记述了鲍永、宣秉、王良的事迹,借张湛之口赞扬鲍永“仁不遗旧,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宣秉为官“俸禄皆以分九族,家无担石之储”;王良虽官至司徒司直,却“居贫守约,妻子不之官”,皆为一时之清廉、仁义良吏。如卷十一记述汉章帝对司空长史江革“常礼之”,江革早年以孝行闻名,乡里称他叫“江巨孝”。在江革事迹之后,该卷连续记述了毛义和薛苞两位以孝著称的历史人物。毛义当年“以孝行称”,为了赡养老母而接受府衙的守令一职,当老母死后便“弃官行服,进退必以礼,

贤良公车征,皆不至”,“天子闻而嘉之”;薛苞丧母,“行六年服,丧过其哀”。分家产的时候,他“奴婢引其老者”“田庐取其荒者”“器取朽者”。如卷十九集中记述了任峻、苏章、陈琦、吴祐、第五访等良二千石,他们的为官风格虽不尽相同,却都在治内得到民心,享有威信。如卷二十二记述了党锢人士陈蕃推荐徐稚、姜肱、袁闳、韦著、李昙“五处士”,并对他们的才性作了描述:徐稚“恭俭义让,非礼不言,所居服其德化”,姜肱“隐居静处,非义不行,敬奉旧老,训导后进”,袁闳“玄静履真,不慕荣宦,身安茅茨,妻子御糟糠”,韦著“隐居讲授,不修世务”,李昙“乡里有父母者,宗其孝行以为法度”。如卷二十五记述了韩融、李楷、郑玄、申屠蟠等人物类传,这些人物的共同点,其一是名噪一时的大学者,其二都重隐居守节,韩融、李楷还以至孝重亲闻名。

重视人物才情风貌描写,是《后汉纪》又一特点。如卷一说光武帝刘秀“为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长七尺三寸,乐施爱人,勤于稼穡”,刘縯“慷慨有大节”,邓晨“好节义”,李通的父亲李守“身長八尺,容貌绝异”,鮑期“身長八尺二寸,容貌壮异”,“气勇有志义”,王霸“慷慨有大志”,邓禹“以德行称”;卷三说鲍永“好文德,虽为将帅,常儒服从事”,卓茂“温而宽雅,恭而有礼”;卷四说马援“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卷五说王丹“好施周急”,“高抗不屈”,周党“举动必以礼”;卷七说张湛“举动必以礼,虽幽室闲处,不易其度,闺门之内,若严君焉”,鄧恽“志气高抗,不慕当世”;卷十说祭彤“气勇过人”,“多恩信,善权略”,班超“倜傥不修小节,而内行甚谨”;卷十一说韦彪“清俭好施,禄赐分与宗族,家无余财”;卷十二说贾逵“身長八尺二寸”,“沈深有用,其所学者可为人师”,“才学皆通其所著论为学者所宗。性佚不修小节”,邓彪“以礼让帅下”,“明帝高其节”,朱晖“少以节操闻”;卷十四说梁竦“轻财好施,不治产业”,“雅有大志”,邓皇后“长七尺二寸”,早年“通《论语》,志在经书,不问家事”,阴皇后“短小,举止时失仪”,王涣“游侠尚气,晚节好儒术”;卷十九说马融“美才貌,解音声,学不师受,皆为之训诂”,“虽好儒术,而服饰甚丽,坐绛纱帐,侍婢数十,声妓不乏于前,弟子以次相授,鲜有观其面者”;卷二十三说黄宪“识度渊深,时人莫得而

① 关于人物容貌品评参见白寿彝《陈寿与袁宏》(载《中国史学史论集》),同时对照《三国志》相关人物传记作了调整和补充。

测”郭泰评其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而不清,挠之而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又评黄元艾“高才绝人,足为伟器”;卷二十五说卢植“所学不守章句,皆精研其旨。身長八尺二寸,刚毅多大节,常喟然有济世之志”;卷二十六说荀爽“最有儒雅”;卷二十七说陈卓“少好任侠”,王允“容仪雅重,非礼不动”,许劭“善于人论臧否之谈,所题目皆如所言”;卷二十九说郑玄“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颠沛,非礼不动”;卷三十说孔融“幼有异才”,杨彪“以孝义称”,如此等等。

范曄的《后汉书》,其人物记述以类相从的特色也很突出。首先,《后汉书》重视设立类传。《后汉书》的类传总共有10个,而其中的《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共7个类传,都是范曄独创的。范曄的创新,决非是为了标新立异,一是为了反映东汉特定社会历史的需要,二是记述各色历史人物的需要。如《党锢列传》的设立,是因为东汉末年发生了党锢之祸,这一事件对东汉后期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党锢人士在东汉后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宦者列传》的设立,是与东汉出现严重的宦官专权的政治局面所分不开的,列传集中记述了东汉宦官群体情况、形成专权的原因以及专权的后果;《文苑列传》的设立,不但反映了东汉一代“文富篇盛”的事实,而且打破了中国古代重“德”轻“文”的历史传统(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使得文学人士在正史中有了自己专门的传记,从而第一次得以与《儒林列传》并列;《独行列传》的设立,是为了记述那些通过“特立卓行”而步入仕途的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豪强政治时代那些没有政治势力的知识分子步入仕途的艰难;《方术列传》记载医巫卜筮和神仙怪异之士,虽然医、巫混杂是其缺陷,但是神仙怪异的记载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谶纬迷信神学的盛行情况;《逸民列传》记载隐居山林而不愿做官的人,由于东汉统治者重视通过“举逸民”而使“天下归心”,从而助长了这种风尚;《列女列传》反映了东汉时代妇女们的事迹,这是范曄的一大创举,他为封建时代的妇女在正史中争得了一席之地。通过类传的设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时期的各类历史人物。

其次,《后汉书》重视同类人物合传。《后汉书》的历史人物记述,同卷人物往往不分时代先后,而是按类编写。分类的办法则是:有的以“治行卓著”,有的以“深于经学”,有的以“著书恬于荣利”,有的以“和光取容,人品相似”,有的以“立

功绝域”,有的以“仗节能直谏”,有的以“明于天文”,等等。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后汉书》以他们都是东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而给予合传;郭泰、符融和许劭三人,《后汉书》则以他们清高有人伦而知名当时予以合传;刘平、赵孝、淳于恭、江革、刘般、周磐和赵咨等数人,《后汉书》则以他们皆有孝行而给予合传,如此等等。这样的历史人物分类记述,显然是受到了玄学品评人物的影响。

二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玄化倾向也表现在重视历史评论上。玄学的清谈,当然不限于人物,“当时名士欢聚一起,清谈品题有名理,有历史,有人物”^[4]¹³⁸。玄学清谈历史、名理之风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史学,则表现为重视历史评论,并且这种历史评论明显地打上了玄学的思想烙印。

在魏晋史家当中,袁宏《后汉纪》的历史评论最具代表性。《后汉纪》一书的“袁宏曰”多达48条,评论的字数少则几十百余字,多则千余字,涉及的内容从政治制度到思想文化再到人物才性,无所不有。《后汉书》的历史评论具有明显的玄化倾向,袁宏重视探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肯定古圣王“君臣穆然”的无为政治,主张为政贵在安静,提出处世智在“顺势有为”,如此等等,旨在援玄入史,具有浓厚的玄学味道。

南北朝时期,北朝经学受汉末郑玄之学影响较大,重视章句训诂,而不尚玄谈;而南朝经学不拘守一家,善谈玄理,结果形成“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5]卷八十一《儒林传》这样一种不同学风。这种南北经学的不同特点,也同样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南北史学撰述上。我们以南朝范曄《后汉书》、沈约《宋书》和北朝魏收《魏书》作比,便能清晰地看到这一时期南北史学的不同特点。《后汉书》和《宋书》,不仅普遍重视历史评论,而且所作的序、论、赞确实体现了南方玄学化史学的“清通简要”“得其英华”的特点,反映了史家的一种历史洞察力。周一良认为,“范曄的史识,正是南方学术倾向的特征在史学方面的体现”。而“沈约《宋书》的序或论,不如范曄之精辟,但也时时可以看出南朝史学如牖中窥日,对历史发展的洞察能力。”“范沈之书的序和论确实体现出‘清通简要,得其英华’的精神。”^[6]范曄对其“善序论”也是颇为自负的,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得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

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反观以魏收所撰《魏书》为代表的北朝史学,给人“相比之下的突出感受,是就事论事为主,拘泥于一人一事论其功过。”表现出明显的记事分散、繁琐,历史评论只是就事论事,缺乏全局观、发展观、联系性和思辨性,“看不到敏锐深刻的高见卓识,给人以识暗之感”^[6],反映了北学“渊综广博”“穷其枝叶”的特点。

纵观魏晋南北朝史学历史评论玄化倾向的具体表现,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历史发展之势的总结。魏晋南北朝史著的历史评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重视对历史发展之势的总结。

袁宏《后汉纪》的历史评论,大气磅礴,纵论古今,重视对于历史发展总像的评述。如卷三评论立君之道,袁宏的基本观点是“立君之道,有仁有义”“立君之道,唯德与义。”他依据上古以来的历史,对立君之道作了详细的评述,认为“上古之世,民心纯朴,惟贤是授,揖让而治,此盖本乎天理,君以德建者也。……中古之世,继体相承,服膺名教,而仁心不二,此又因于物性,君以义立者也。”在此,袁宏看到了上古之世与中古之世社会的差异,肯定上古是个古朴的社会,君主以德而立,以贤治国;而中古之世,随着尊亲名教的出现,君主以义而立,靠名教治国。接着袁宏结合周秦以来的历史发展,评述了德道与义道的循环出现及其社会政治背景。袁宏认为“高祖之有天下,以德而建矣”。道理很简单,因为周秦末世社会变乱,“义心绝于姬氏,干戈加于嬴族”,只有有德者,才能成拨乱之功。而王莽篡汉,导致新的天下大乱,人们思念刘氏之德,“于是斯也,君以义立”,所以更始以来的反王莽斗争,都是“秉义而动”。卷六评论为政之道,袁宏也是结合对于古往今来历史的考察,认为不出德与法二途,而且德与法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袁宏说:古代“圣人顺人心以济乱,因去乱以立法。故济乱所以为安,而兆众仰其德;立法所以成治,而民氓悦其理。”然而中古以来,“政繁民弊,牧之者忘简易之可以致治,御之者忽逆顺之所以为理”,结果导致“变诈攻夺”不断,法律不能禁止。由此袁宏得出结论“论治法之大体,必以圣人为准格;圣人之所务,必以大道通其法。”卷十三论礼,袁宏对礼的产生与发展变化过程作了系统考察,不但揭示了礼的本质,也肯定了礼的因革损益特性。袁宏

认为,礼的本质是“在于爱敬,自然发于心诚而扬于事业者”。圣人制礼,只是“因其自然而辅其性情,为之节文,而宣以礼物,于是有尊卑亲疏之序焉”。随着历史的发展,礼也会因革损益,如“古者民人淳朴,制礼至简”,而“中古损益,教行文质”。由此袁宏总结说“王者之兴,必先制礼,损益随时,然后风教从焉。”卷二十二论风俗,袁宏认为风俗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春秋时期,“礼乐征伐,霸者迭兴,以义相持,故道德仁义之风往往不绝”;到了战国纵横时代,“强弱相陵,臣主侧席,忧在危亡,不旷日持久以延名业之士,而折节吐诚以招救溺之宾……而游说之风盛矣”;刘汉崛起之时,“草创大伦,解赭衣而为将相,舍介冑而居庙堂,皆风云豪杰……而任侠之风盛矣”;元、成、明、章时期,“尊师稽古,宾礼儒术,故人重其学……而守文之风盛矣”;到了东汉中期,“主失其权,阉竖当朝,佞邪在位,忠义之士发愤忘难,以明邪正之道,而肆直之风盛矣”。很显然,时代风俗的变化,与时代政治息息相关。纵观《后汉纪》一书,其历史评论大多诸如此类。

范晔《后汉书》共有9篇帝纪,历述了从光武帝到汉献帝前后二百余年的朝政大事。这9篇帝纪都有论赞,分开来看,是对东汉各朝政治得失的评述;合起来看,则是一篇完整的东汉兴亡论。如汉光武帝是刘家皇朝中兴之主,篇后论赞揭示了刘氏中兴的原因“灵庆既启,人谋咸赞”;明、章二帝作为守成之君,一个明于法制,一个敦厚宽政,因而出现了“气调时豫,宪平人富”的太平局面;和帝时期是东汉政治转折期,外戚、宦官专权自此始,故而论赞以“颇有弛张”点题;安、顺二朝,外戚、宦官专权愈演愈烈,东汉皇朝衰局已定,所以论赞称其为“彼日而微,遂侵天路”;桓、灵时期,宦官专权,党锢祸起,东汉皇朝已经分崩离析,所以论赞说其“征亡备兆”;至汉献帝时,东汉皇朝终于寿终正寝,所以论赞叹其“身播国屯”。

《后汉书》还重视通过对具体史实的历史评论,来探寻具体政治得失以及政治与社会风气等问题。如关于宦官专权问题,《宦者列传序》追述了东汉以前宦官的由来及其对于政治的危害情况,详细叙述了东汉时期宦官势力的发展及其对东汉政治的严重危害,由此卷尾论道:宦官专权“其所渐有由矣”“亦岂一朝一夕哉!”认为统治者要避免宦官专权局面的出现,就必须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又如关于士风与政治的关系,《党锢列传序》通过对历代士风演变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的论述,肯定了古代士风纯朴是圣人“陶物振

俗”的结果,而春秋战国的霸政促使了士人以卖弄机智、策划计谋为时尚,汉朝经学的兴起则出现了士人间的党同伐异之风,而汉末昏暗政治则激起了士人的清议之风。毫无疑问,政治导致士风的演变,而士风反过来又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再如关于隐士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逸民传序》首先分析了人们归隐山林的各种不同原因,“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接着揭示了东汉隐士风气浓厚的正反两方面原因,认为王莽篡汉,导致了大量士人归隐山林,而东汉自光武帝以来效仿古圣王“不屈”隐士的做法,寄希望于“举逸民而天下归心”,则助长了这样一种社会风气。如此等等。《后汉书》的各类具体历史评论,普遍重视从社会大背景去进行分析,注意探寻事物发展的前因后果,分析深入,脉络清晰。

第二 顺天达命与维护名教。魏晋南北朝世族政治的最大特点,是世族地主世代把持国家政权,享受各种社会特权,他们的政治地位不以政权的更替而改变。玄学则是一种服务于世族政治的学说思想,它要为这种政治的合理性进行解说和辩护。受世族政治与玄学思想影响的魏晋南北朝史学,自然也肩负起了这样一种使命,其具体表现则是自觉宣扬顺天达命与维护名教的思想。道理很简单,“顺天达命”袍笏登场,自有世族的好处;忠贞节义,死而无悔,对于维护封建伦理大有用处,对于世族保有既得的利益也同样大有好处,就仍然值得拥护了。”^[2]

陈寿《三国志》被《晋书》本传称赞为“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这里所谓“风化”,自然是“有益”于世族的风化。《三国志》通过历史记述与历史评论,所要有益风化的,首先就是肯定朝代更替的合理性。在陈寿看来,王朝的更替,既有人为的因素,更是天命使然。如在评述曹魏代汉时,《三国志》一方面肯定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7]卷一《魏书·武帝纪》另一方面又认为曹魏代汉是天意使然。在《武帝纪》记述曹操败袁绍时,陈寿以50年前“黄星见于楚、宋之分”作预兆,《文帝纪》记述曹丕称帝之年,以前后45年两次出现“黄龙见谯”来表明天意所归。既然王朝更替是天意,人们只能顺应天命。故而他及时对归顺新朝的人给予赞许,如《谯周传》称赞谯周倡议投降说“刘氏无虞,一邦

蒙赖,周之谋也。”《王朗传》称赞钟繇、华歆、王朗三人“诚皆一时之俊伟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

其次是维护纲常名教。陈寿历经汉魏与魏晋先后禅代的历史,作为晋朝史臣,出于维护封建政治伦理的需要,《三国志》因诸多不得已的苦衷而不得不在记述中为统治者有所隐讳、袒护,但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忠贞节义却很重视宣扬,如在《吕布臧洪传》里,他称赞“陈登、臧洪并有雄气壮节,登降年夙陨,功业未遂,洪以兵弱敌强,烈志不立,惜哉。”《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称赞“田畴抗节,王修忠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袁宏《后汉纪》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为撰述旨趣,故而“笃名教”是其历史撰述与历史评论的主要目的。作为玄学中人,袁宏史学的“笃名教”,自然也具有鲜明的玄学特色。首先,袁宏对《左传》以来的历代历史撰述从名教角度作出了评判。袁宏说“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赅而未叙。”^[8]《自序》在此,袁宏对《左传》《史记》《汉书》和《汉纪》一一进行点评,指出其中的优点和不足,尤其推崇荀悦的《汉纪》。但是,如果从“笃名教”角度而言,袁宏对这些史著都不太满意,而这,也正是袁宏为什么要撰写《后汉纪》的原因所在。“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8]《自序》

其次,袁宏从探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名教的本质。袁宏说: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辨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辨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8]卷二十六《献帝纪》。

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肯定名教之本是讲君臣父子关系;二是强调君臣父子的高下、尊卑关系是“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因而是永恒不变的。袁宏以“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来论说名教,强

调名教的自然本性,这显然是以道家自然无为的观念来解说传统儒家的名教观,明显打上了玄学家的痕迹。

最后,袁宏强调“大建名教”的必要性。袁宏说“大建名教以统群生,本诸天而深其关键,以德相传,则禅让之道也。暴极则变,变则革代之义也。废兴取与,各有其会,因时观民,理尽而动,然后可以经纶丕业,弘贯千载。”^[8]卷三十《献帝纪》在此,袁宏强调了“大建名教”与“观民”的重要性。在袁宏看来,名教是用来“统群生”的,是维系社会与政治的一种礼制,因而也是直接关系到历史治乱兴衰的,必须“大建”;而“观民”是观察民众对所建名教的反映,而名教的本质是“德”,统治者推行德政,就必然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而滥施刑法,政权就必然会被“革代”。从这样一种名教观出发,袁宏进一步强调了推行德政和重视民众的重要性,所以他接着说“是以有德之兴,靡不由之,百姓与能,人鬼同谋,属于苍生之类,未有不蒙其泽者也。……及其亡也,刑罚淫滥,民不堪命,匹夫匹妇莫不憔悴于虐政,忠义之徒由自效其诚,故天下嚮然新主之望。”^[8]卷三十《献帝纪》由此来看,名教、德政对于国家的存亡是何其重要!

范晔《后汉书》否定各种方术与怪异,公开反佛,倡言死者神灭,宣扬了无神论思想。同时,范晔又是一个天命论者,《后汉书》也讲顺天达命。如《光武帝纪》在论述光武中兴问题时,范晔一方面肯定了刘秀的人为作用,如他审时度势,与兄定谋起兵;昆阳大战,勇武建立奇功;兄长被杀,韬光养晦全身;经营河北,废除王莽苛政,收降铜马(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一支)余众;平定天下,及时与民休息,如此等等,很显然,光武中兴局面的出现,与光武帝的个人作用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范晔又将刘汉再兴归于天命。如《光武帝纪》在叙述刘秀定谋起兵前,特意记载了宛人李通等人“以图讖说光武”一事,其讖语是这样写的“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刘秀即是根据这个讖语而与李通等人起事于宛的。刘秀登基前,他当年在长安太学的同学强华从关中捧来一个匣子,里面装着《赤伏符》,上面写道“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这是一个预示着刘汉火德再兴的讖语,刘秀有了这个神符,也就有恃无恐地当上了皇帝。更有甚者,在这篇本纪的末尾论赞中,范晔还大谈刘秀出生时及起兵后的各种怪异现象,如出生时赤光照室,这一年县界有嘉禾生,起兵后舂陵城上有王气笼罩,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人说刘秀当为天子,如此等等,于是范

晔说道“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毫无疑问,范晔是相信王命天授的,是一个天命论者。

第三,为政贵在安静。玄学政治观的特点,是具有老庄无为而治思想。表现在具体治政主张上,则是强调为政贵在安静。

袁宏《后汉纪》的历史评论,首先明确提出了为政“贵在安静”的主张。袁宏说“古之有天下者,非欲制御之也,贵在安静也。故修己无求于物,治内不务于外。”^[8]卷十四《和帝纪》这是袁宏玄化政治主张的典型表述。在他看来,政治只求静,不务动;只求修己,不求于物;只求治内,不务治外。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清静无为。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袁宏将历史截然分成三代与五霸秦汉两段,肯定三代圣王无为政治,反对五霸秦汉有为政治。袁宏说:

自三代已前,君臣穆然,唱和无间,故可以观矣。五霸、秦、汉其道参差,君臣之际,使人瞿然,有志之士,所以苦心斟酌,量时君之所能,迎其悦情,不干其心者,将以集事成功,大庇生民也。虽可以济一时之务,去夫高尚之道,岂不远哉!^[8]卷四《光武帝纪》

在袁宏看来,三代以前与五霸秦汉时期的根本区别,是三代以前的君臣“穆然”,而五霸秦汉时期的君臣则“瞿然”。换言之,前者是一种无为之道,而后者则是一种有为之道。因此,尽管五霸秦汉时期的君臣通过积极有为,也能成一时之功,却与高尚的无为之道相去甚远。由此来看,同样是法先王、崇三代,袁宏与先儒却有着很大的区别,他是从玄学的立场去评判和肯定三代以前的政治的。

从这样一种无为政治观念出发,袁宏对历史上各朝的安边政策与政治安定之间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认为唐尧、虞舜、三代圣王统治时期,他们对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羁縻而弗有”的政策,让他们“习其故俗”,其结果是圣王们“君臣泰然,不以区宇为狭也”,而“天下义安,享国长久”。而秦、汉时期,君王们忙于开疆拓土,这一时期的疆域数倍于圣王时期,然而还不满足,还要“西通诸国,东略海外”,其结果则是“地广而威刑不制,境远而风化不同,祸乱荐臻,岂不斯失!”^[8]卷十四《和帝纪》袁宏上述关于历代君王治边的议论,在颂扬三代以前古圣王的同时,对秦汉以来作了全盘否定,他不但反对秦汉的拓边政策,甚至反对“西通诸国”的做法,这就等于将这一时期正当的反击匈奴的战争和正常的与域外的交往都一概否定了。如对东

汉时期出使西域的著名外交家班超,袁宏就说:“班超之功非不可奇也,未有以益中国,正足以复四夷,故王道所不取也。”^[8]卷十四《和帝纪》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秦汉时期也有不少无谓的战争,是统治者为了好大喜功、为了能后世留名而发动的,这种战争劳民伤财,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袁宏说“当世之主,好为身后之名,有为之人,非能守其贫贱,故域外之事兴,侥幸之人至矣。”^[8]卷十四《和帝纪》袁宏的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当然,袁宏在安边政策上推崇三代、反对秦汉,从根本上说,还是其清静无为玄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袁宏还进一步从安静无为的思想出发,对统治者因其“多欲”而导致“民疲”提出批评。他说“然富有天下者,其欲弥广,虽方丈黼黻,犹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充耳目之玩,则神劳于上,民疲于下矣。”^[8]卷十八《顺帝纪》认为他们的多欲,结果只能是既让自己劳神,又使百姓疲惫。袁宏还特别对秦汉以来末世君主生活奢侈、大兴土木提出批评,他说“末世之主,行其淫志,耻基堂之不广,必壮大以开宫;恨衣裳之不丽,必美盛以修服;崇屋而不厌其高,玄黄而未尽其饰。于是民力殫尽,而天下咸怨,所以弊也。故有道之主,睹先王之规矩,察秦汉之失制,作营建务求厥中,则人心悦固,而国祚长世也。”^[8]卷九《明帝纪》在袁宏看来,统治者要想取悦于民众,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尊崇先王旧制,除去多欲之私。很显然,袁宏的人欲论,其中也蕴含了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因而是玄学思想的体现。

范曄《后汉书》的历史评论,也突出了一个“静”字。如关于光武帝开国政策的评论,《光武帝纪》后有这样一段议论“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徼急,未尝复言军旅。……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这段话前面一层含义是说光武帝在一统天下后,深知长期战争已经导致天下民力疲惫,因此不愿再兴武事,而要偃武修文。后一层含义是说天下平定后用人政策的变化,具体做法是对一同打天下的功臣贵而不用,而将一切吏事归于三公,这便是“退功臣而进文吏”。《后汉书》对光武帝在平定天下后,及时推行轻徭薄赋的与民休息政策,是持肯定态度的;至于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的做法,范曄也是心领其意、予以肯定的。在《马武传》后论中,范曄以萧何、樊哙与韩信、彭越的故事叙述了功臣之间“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的道理,

认为光武帝正是由于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才“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的。这样做,既保全了功臣,又维护了皇权;既进用了人才,又有利于治国治民。毫无疑问,在范曄看来,光武帝的做法不啻为明智之举。

在对东汉一些具体政治的评述上,《后汉书》也处处体现了为政“贵在安静”的思想。如关于东汉的安边政策,《后汉书》对此提出了批评。东汉时期,羌人曾先后三次掀起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虽然最终东汉政府镇压了羌人的反抗,可也因此而大大损耗了国力,正如范曄所说的“寇略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8]卷八十七《西羌传》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范曄认为要归因于羌人内迁。在《西羌传》论中范曄指出,东汉政府允许羌人内迁已经是失策了,而对内迁的羌民没有加以安抚则是错上加错。《后汉书》认为,东汉政府对于南、北匈奴的政策也有重大失误。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顺东汉,光武帝让他们迁居西河,以便协助东汉对北匈奴的防御。汉和帝时窦宪彻底打败北匈奴后,东汉政府应该将南匈奴迁往北庭,而退河西为内地,可是东汉政府依然让北匈奴居于旧庭,从而导致了后来匈奴势力的蔓延。《南匈奴列传》论及此事,愤恨之情跃然纸上。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史学重视人物品评与历史评论,其人物品评重视人物才性与风度容貌,其历史评论重视援玄入史,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史学的玄化倾向。

参考文献:

- [1] 任继愈. 中国哲学发展史: 魏晋南北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 [2] 白寿彝. 陈寿和袁宏[C]//中国史学史论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3] 吴怀祺. 中国史学思想史[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6.
- [4] 孔繁. 魏晋玄谈[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 [5] 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6] 周一良. 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M]//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7]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8] 后汉纪: 两汉纪下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9]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责任编辑: 那晓波]